

庄福龄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学科建设的开创性贡献

——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金海教授

本刊记者

杨金海，男，1955年生，河南林州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和项目首席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首届“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传播史研究，著有《人的存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研究读本》等十多部著作，主编国家出版项目《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37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40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35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世界传播通考》100卷以及《黄相森文集》《姜椿芳文集》《张仲实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庄福龄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今天，进一步学习研究庄福龄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创性贡献，缅怀先生的丰硕理论成果和崇高治学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金海教授。

▲（采访者简称▲，下同）：庄福龄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领军人物，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都作出了卓越贡献。杨老师，请您谈谈对庄福龄先生的总体看法。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您的评价很中肯。我想再补充两句：庄福龄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卓越代表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开创者。

庄福龄先生与我的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相森先生长期亲密合作，切磋学问，志同道合，令人感动。我作为后学，曾多次亲自聆听他的教导，研读他的著作文章，获益良多。值得庆幸的是，庄福龄先生还是我的博士论文审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曾给予热情鼓励和亲切指导。所有这些都使我受益终生，永志不忘。尤其是近30年来我和我们团队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如果说有一点成绩的话，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庄福龄先生的思想引领。庄福龄先生于2016年离开了我们，但其道德文章、学术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对庄福龄先生的

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传承其学术思想，特别是对庄福龄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应当大力研究、弘扬光大。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提出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老一辈学者特别是庄福龄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哪些？

●：我国老一辈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贡献是很多的，特别是庄福龄先生在这方面贡献巨大。其主要贡献是提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统领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庄福龄先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开创者。其代表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及其修订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就是明证。

▲：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究竟有何意义？

●：其意义是非常大的。对于任何一个问题，人们都可以研究，但只有当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设时，才能对它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也是这样。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之，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中央编译局的专家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为中央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以，要使经典著作翻译越来越准确，就需要研究和考证有关经典著作翻译的历史，特别是要对原有的经典翻译文本、版本等进行历史梳理和考证研究，也需要对经典著作的原文版本进行历史性的考证和比较研究。为此，中央编译局的老前辈们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研究，同时也开展宣传普及工作。比如，1954年，中央编译局举办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展览；195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中央编译局又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举办展览；1963年，中央编译局专家丁守和、殷叙彝发表了《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央编译局举办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之后编辑整理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一书；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中央编译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创作了两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并举办了“《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专题展览；201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编译局创作了八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思想的历程》，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一书，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这些都是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近几十年来，为推进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央编译局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世界传播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包括MEGA1和MEGA2）进行了研究。其他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在这些方面也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就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工作还不够全面系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传播研究较多，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的传播及其创新发展的研究比较薄弱，特别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研究不足，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建设。

庄福龄先生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第一次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与我们党的理论

创新发展研究相结合、与学科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相结合，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建设。1988年，庄福龄先生主编并出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一书，被教育部确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交织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聚集充分的资料和人力，开展深入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①。他还明确提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任务、内容和方法等，由此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理论体系。在2015年出版的该书修订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中，庄福龄先生又重申了这些基本思想和观点；之所以要加一个“论”字，我理解主要是为了突出该书的特点，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不能仅仅研究经典文本等的传播史，更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创新和发展的历史研究。

▲：为什么庄福龄先生能够独具慧眼，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

●：庄福龄先生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这门新学科，是与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分不开的。正如他在《六十年学术生涯回顾》一文中所说，1949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51年开始在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195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进修，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55年之后，他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又主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课程^②。在6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庄福龄先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他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几十部，其中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等。

这些学术成果充分反映了庄福龄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理路和心路历程。庄福龄先生的学术理路是“由论入史”“论从史出”“由史立论”。

所谓“由论入史”即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等基本理论，然后逐步深入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也是逐步深入的，即首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再研究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史，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实际上也开始了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可见，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即从点到面、从静态到动态、从发展史到传播史，层层深化、逐步递进的治学历程。没有前面的“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史”的研究；没有对“发展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对“传播史”的研究。因为只有对“论”有了深入思考，才会去追问“史”的问题，即追问这些理论观点的发展历史、来龙去脉；只有对“发展史”有深入思考，才会去追问“传播史”的问题，即追问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在中国传播中是如何一步一步被中国人所选择、翻译、理解和接受的。

所谓“论从史出”，就是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和考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对经典作家理论观点的认识；也只有以史实为根据，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只有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认识才更全面、更系统；对历史的评价才更科学、更令人信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晚期比早期的看法更深刻、更全面。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全貌，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

① 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② 参见庄福龄：《六十年学术生涯回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

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史，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所谓“由史立论”，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研究，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和突出特点等，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研究，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传播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

当然，庄福龄先生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门新学科，还与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教学相联系。教师教学面对的是学生，讲课需要清晰明了，而且教学内容需要学理化、系统化、规范化，还需要对有关理论进行历史考察，理清来龙去脉；同时，还需要联系实际，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庄福龄先生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特别是培养了很多硕士、博士，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中坚力量。正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庄福龄先生逐步探索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路径和方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

▲：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应当有怎样的学术视野和总体方法？

●：应当有“历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双重视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就不可能提出并深入推进；但没有学科建设的思路和视野，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来建设。庄福龄先生正是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并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完美结合起来，才提出了一套系统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思想。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任务和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也是如此。在庄福龄先生看来，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需要确定这门学科的对象、内容、任务和方法。这应当说是构建这门新学科的总体方法。

▲：那么，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对象，庄福龄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①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研究对象的科学界定，同时也为科学界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对象提供了基本范式。可以看出，在庄福龄先生这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具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传播史”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基本原则和基本知识的传播；广义的“传播史”则不仅研究经典文本、基本原则和基本知识的“传播”，更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应用”和“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归结为单纯的历史纪年和史实的陈述与罗列”^②，而应当作更广泛的研究。概括起来，至少要作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在中国“传播”

① 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② 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

的历史；二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由此来总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验和教训；三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四是要作“历史比较”研究，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存在的各种思想流派相比较，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生命力；五是要作“国际比较”研究，即把国际上马克思主义传播情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情况进行比较，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和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六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等，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基本功。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基本功打扎实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门新学科才能发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由这门学科的对象所决定的，或者说是其对象之界定的进一步展开。庄福龄先生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

一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史的关系看，这二者的研究内容不完全相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中国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有密切联系。但二者研究的内容又有明显区别。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特别是要研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研究、理解、接受、应用、发展等，并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等作出科学的分析评价。

二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关系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围。它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既要结合中国实践，又要超越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主要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研究。

三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关系看，二者研究的内容不尽相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但它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应用、发展，对其他相关思想理论只作背景性研究，旨在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四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毛泽东思想史的关系看，二者研究的内容也有很大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无疑要以毛泽东思想史为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但又不限于此，还要研究其他思想家的贡献，包括历史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教育家等的思想成果，展现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多姿多彩、奔腾不息的历史画面。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使命任务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使命任务，是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就、经验、规律，坚定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推动党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庄福龄先生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以历史材料为基础，但又不能局限于历史的枝节研究，而要从哲学的高度、从历史规律的高度、从指导实践发展的高度来展开。围绕这一思想方法，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发。

一是要总结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就、经验，启迪人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是指引中华民族不断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通过历史材料分析，充分反映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二是要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点、命运，启发人们自觉地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走历史的成功之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巨变密切联系在一起。由此，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命运十分鲜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一种学说逐步转变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在这一历史洪流中不断传播、普及、创新发展，显示出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充分反映这一思想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三是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这种改变世界的力量特别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世界观和思想路线的变化方面。如毛泽东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形成全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些都是从哲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范例。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就是要通过这些研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伟力，鼓励人们自觉学习研究这门新的历史学科。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使命任务决定了其学术旨趣，这就是要通过上述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形成一门新的历史科学，建立新的“历史课堂”。具体说来，一是为提高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开辟一个有启迪意义的历史课堂，二是为人们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生动的历史课堂^①。一句话，要引领人们“守正创新”，自觉学习科学理论、自觉创新科学理论，为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支撑。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这门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庄福龄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在他看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当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出发，把握这门科学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作为我们研究的向导”^②。这就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提供了基本方法论。这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既是认识世界的武器，又是改造世界的指南。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应当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理论上，要看这一学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的内容是否科学、完整、准确；在实践上，注重分析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情况，要看是否把这一理论当作观察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工具、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造社会的方案。这样，才能对历史上的理论传播和实践应用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是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对实践问题的概括和回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动力是中国实践。所以，不能仅仅研究书本理论，还要深入研究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斗争、重大历史事件、重大社会问题等，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特别要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中不断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

三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面对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和俄国的东方国家，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理论，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要充分反映这一点。

除了上述基本方法之外，庄福龄先生还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许多具体方法，包括史论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国

① 参见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② 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相统一等原则和方法。在这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了充分彰显。庄福龄先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对这些科学方法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除了上述基本内容、使命任务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还应当研究哪些内容，解决哪些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还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分期、历史条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特点等进行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国内学界还存在不一致的认识，应当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分期，在庄福龄先生看来，应当与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一致。其中，包括建党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等。这是十分科学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还特别指出，对十月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有清醒的认识，当时的传播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片言只语的介绍和解释，对此可以研究，但不能对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估计过高。这一观点的提出非常重要，为我们今天建立这门历史科学确定了基本的历史划分原则。目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分期问题上尚有不同意见，历史分期的随意性较突出，所以大力弘扬庄福龄先生的这一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应当如何深入研究历史条件问题？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条件研究，庄福龄先生也讲得很清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与西方不同，与俄国也有很大区别，只有深入研究清楚这些历史条件，才能深刻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和规律。为此，至少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要研究近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仁人志士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第二，要研究十月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历史。这一点非常重要。至今我国思想界还有人弄不清十月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区别，常常把“民主”和“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旗帜，但实际上，正如庄福龄先生所说，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这些思想“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只是到了五四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大力传播和影响下，大批有识之士才意识到，不能只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更紧迫的任务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精神，要“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同时也要“反封建”，争取国家富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与西方民主革命所根本不同的地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反帝”的任务。所以，简单学习西方是不行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今天我们把五四精神概括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非常科学的。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就没有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

第三，要研究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新旧文化运动交替的时期，是历史的大转折，其根本原因在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怀疑、抛弃，对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开始追求、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顺应了历史潮流，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目标，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产物，党的成立又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二者相互促动，推动党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前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要把这一经验讲透彻。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俄国等相比有不同之处，应当怎样研究这些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必须注重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对此，庄福龄先

生明确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总体上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不同。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中国人经过十月革命而认识和接受这一科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还是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同学习列宁思想的新贡献相结合的过程；等等。同时，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也各有特点。比如，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理论传播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的传播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等。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应当把这些特点都讲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理论逻辑和实践成果。

▲：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问题是相当丰富的。

●：是的，正是以上述学术思想为主干，庄福龄先生还就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很多具体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

三、庄福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与启示

▲：怎样进一步认识庄福龄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可以说，庄福龄先生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研究，二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在中国创新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研究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些思想成果很好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为后人深入研究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画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庄福龄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新范式，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打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研究领域的思想空间，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也为新近确定的党史党建学科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门新科学，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既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门基础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一道来研究和建设，也可以作为党史党建学科的一门基础学科来研究和建设，还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化史等的重要内容来研究。

▲：我们应当怎样继承庄福龄先生这些宝贵的思想成果，继续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引向深入？

●：任何一门学科研究和建设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庄福龄先生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以及很多独特的思想观点之后，也认识到这项研究仍然有待深化，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的思路。

庄福龄先生的这些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的。比如，应当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传播史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对史论关系的辩证认识；进一步加强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研究；进一步加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在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整体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断代史、地方史、概念史、人物传记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建设；等等。（下转第64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强调哲学的实践化，创立实践化的哲学。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鲜明的实践目的。毛泽东创作《实践论》，就是为了确立实践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确立实践的标准和导向。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指明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实践要求就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内含着实践导向、矛盾导向，把问题作为实践内核、矛盾所在的概括性表述，凸显了问题的实践功能。坚持问题导向，内含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二者在问题导向中融为一体，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内含着指向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逻辑，环环相扣、步步递进，构成了以问题为中心、为主线的实践展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引新征程、实现新使命的科学指导。在新征程创新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深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把包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内的“六个必须坚持”融为一体，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功能。要把坚持问题导向内化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之中，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要不断提高坚持问题导向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编辑：荀寿潇）

（上接第16页）这样，就使得我们未来工作的思路 and 方向更加明确。

近年来，我们的工作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由此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和建设。比如，近年来北京大学以顾海良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开展的《马藏》研究、清华大学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由艾四林、李惠斌和我主持）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又如，近年来很多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队伍中来，有的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国内传播、国际传播考证研究，有的开展各个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有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方传播史研究，有的进行马克思主义概念史研究，等等，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贡献了力量。

时代在前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事业仍然需要大力加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一定要继承庄福龄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事业，矢志不移，奋力拼搏，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和建设工作谱写新的时代篇章。

（编辑：黄华德）